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外交

张 春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能说一帆风顺，但总体呈螺旋式上升。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必须赋予发展中国家新的战略定位，以推动中国“体系内创新型崛起”战略的实现。

一、建国 70 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

建国 70 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发展，目前正处于第三时期的前期。

第一个时期，是中国“站起来”时期，大致是从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前。

这一时期又可分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中苏分裂前，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核心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客观地看，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毁誉参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分裂可谓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的三大“麻烦”；相比之下，往往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才是维持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二阶段是中苏分裂后至改革开放启动前，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正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支持，中国得以恢复联合国地位；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这一时期达到第一个历史高潮，但总体仍停留在“政治团结”的水平。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富起来”时期，大致从改革开放到 2009 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或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时期也可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9 年政治风波前十年左右时间，中国战略目标转向“富起来”，交往对象重点转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关系忽视严重。当然，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也带动了中国与其他一些存在历史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系改善。

第二个小阶段是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尽管与发达国家关系仍是“重中之重”，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战略定位得到缓慢回升。20 世纪 90 年代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核心是危机应对，包括 1989 年后的西方制裁危机，1997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苏联解体后的边界划分问题，等等。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点是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的发展，典型是中非合作论坛，但不够系统，发展也不够平衡。

第三个时期，大致可以说是自奥巴马政府上台或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与中国“强起来”大致相对应。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希望中国“强起来”，因此阻遏中国崛起的战略日益清晰和完善，中国现在不得不重新借重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正迅速完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特别是“正确义利观”得以提出。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未来展望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战略重要性正在上升，但中国外交对此的战略意识仍不够强，公众更缺乏此类战略自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重要性上升，根源上源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改变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崛起战略调整。

中国崛起战略环境的根本变化在于，此前发达国家认为帮助中国“富起来”便可使中国“社会化”，从而可规制“强起来”的中国，甚至根本上管理中国的“强起来”；但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其“富起来”与“强起来”根本不是西方所能控制或“社会化”的。因此，西方试图在中国尚未完全“强起来”之前，改变战略，阻遏甚至中止中国的“强起来”进程。

这一战略环境的根本变化，要求中国必须调整崛起战略，即从此前的“体系内效仿型崛起”，转变为“体系内创新型崛起”。一方面，中国崛起仍需在体系内实现，这决定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仍相当重要；但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必须是创新性的，这种创新一是放弃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即武装崛起，二是扭转大国崛起的溢出效应，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上的“受害者”转变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

根据这一战略调整，中国外交应提高发展中国家新的战略定位，改进战略战术，做实中国的“体系内创新型崛起”，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塑造战略自觉：一方面，中国是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崛起的，即使“强起来”也无缘加入发达国家阵营，因此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继续植根于发展中国家阵营；另一方面，中国将持续崛起，经济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早晚的事情，因此必须从战略心理上将自身视作发展中国家的先锋队，从战略上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二是提供战略实惠：最直接的战略实惠，是使“一带一路”倡议、进口博览会等中国崛起的积极外溢朝发展中国家倾斜；间接的战略实惠，是要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思想性、安全性、治理性的公共产品，如强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供更多安全援助等。

三是完善战略保证机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潜在困境是，中国达成发达国家水平后，如何继续维持“发展中国家”身份，如何从战略上使发展中国家信任？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再保证机制的核心是战略捆绑机制，这种捆绑是将中国绑在发展中国家的战车上，而非相反；当前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有这一潜力，但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其内部劳动分工体系需要进一步合理化。

【完】